

唐元竑的杜甫研究

刘文刚

〔摘要〕 唐元竑往往从杜甫的作品出发，结合唐代的史实和杜甫的生平，对唐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学情况进行研究，多有发明。运用传统诗歌理论研究杜甫和杜诗，也有新的见解。在对杜诗进行微观研究时，也有深入细致的心得。对于杜诗的传统解说和注释，他提出一些不同看法。对于前人随意改杜诗，也有批评和是正。历代研究杜甫的作品，一般只论诗，不论文。唐元竑大量论杜甫之文，对杜甫研究领域有重要拓展。总之，《杜诗攷》对杜甫和杜甫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进而对相关的唐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和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，多有创新与建树。

〔关键词〕 唐元竑 杜甫研究

唐元竑，字远生，乌程（今浙江吴兴市）人。万历举人。有节义，明亡，不食而死。著有《杜诗攷》。

《杜诗攷》是唐元竑读杜集的随笔。唐元竑对杜甫和杜集非常推崇，但不迷信，故而他的研究多能从实际出发。他的研究也较少框框，因此能研究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问题，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，较少人云亦云。而随笔的形式又可以使他在表述时充分发挥。这样，《杜诗攷》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与价值。

唐元竑往往根据杜甫具体的作品，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和杜甫的生平，研究一些社会现象，一些文学现象，提出自己的

观点。谈论安史之乱，评论唐玄宗和安禄山：“开元帝固是英才，自郭元振以社稷功坐练兵不振，几死纛下，是后军政一变，几复贞观之初矣。然实内耽逸乐，未尝以身率之则，委任之人宠过而骄，亦思效尤，从令从好，势所必至。且禄山天性鸷悍，严而寡恩，士卒畏之，其一时边功亦非幸致，不如此，何以能作贼耶？”《杜诗攷》卷一，以后略去书名）谈杜甫喜欢在诗中自我称颂“赠韦左丞诗……至‘纨绔不饿死’一篇，高自标置，抑又甚矣。然终于难撼东入海，西去秦，所谓何天不可非也。当时士子干谒公卿，惯用此法，谓之揜阖。……虽士子恶习，然

作者：刘文刚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610064。

终是盛世事，盖必海宇右文，公卿下士时始有之。其初始于一二豪杰，急于自见，稍露锋锷，适遇当道，虚怀爱才，倾盖纳交，遂成佳话，于是不安贫贱者群起效之，遂相沿，有傲妄之目。然傲则非妄，妄则非傲。傲者有而不能藏，如瘦人多骨，妄者无而诈为有，如病人浮肿，相去天渊。世人极言傲妄，所谓泾渭不分，故使伪者售而真者绌也。如公有激之言，虽稍不逊，要非妄也。乃其后，妄人竟为当道所厌恶，故杜佑之客至召与食而面数之。甚者如陈少游，杀之矣。致使韦布胆寒，变为称颂功德，胁肩谄笑，以觐余沥，而‘一剑霜寒十四州’，欲改为‘四十’，始许相见，摘词家复何所容其足乎？此可以观世变也。”（卷一）认为杜甫喜欢自我标榜，其目的是用世，是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。对杜甫没有贬斥，也没有掩饰，分析符合实际，深刻而令人信服，使我们对杜甫与社会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

在研究杜甫和杜甫作品的时候，唐元竑往往对传统的诗歌理论有新的认识，有更深的感悟。他认为杜甫、李白的诗所以超乎一般诗人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豪气超越一般人。他说“论诗当以气为主。气之豪，上无过青莲，而少陵直欲过之。观其喜则手足欲旋，闷则发狂大叫，乃至‘新松’、‘恶竹’、‘莺语’、‘花开’等句，虽小景细事，并有一种鸷猛之性溢于言外。而搜其心曲，则青天白日迄于老困没齿无改变。如此人，安得不千古乎！青莲豪而畅。少陵豪而郁，凡其笔端奇恣横溢，皆郁所为也。摩诘天资近道，其见地超乎李、杜，然评者谓其诗高者似禅，下者似僧，终逊李、杜一筹者，以其气平和

不能雄耳。”（卷二）这里所谓气，就是感情，是指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强烈关照和感悟，并把它浓烈而真挚地表现在诗中。这样来理解诗的气，理解李白、杜甫的气，具体而新颖。历来论诗都强调真实，唐元竑认为诗贵真。诗真最重要的是情真，以真情写真事，出自天性，不因袭。他说“诗无妙诀，但贵真耳。愁即真愁，喜即真喜，流自至性，无所因仍，则不待冥搜，自然警策。如《新安吏》诗‘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’《新婚别》诗‘勿为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。妇人在军中，兵气恐不扬。’《垂老别》诗：‘老妻卧路啼，岁暮衣裳单。孰知是死别，且复伤其寒。’《无家别》诗‘久行见空巷，日瘦气惨凄。’又‘家乡既荡尽，远近理亦齐’等语，真觉肠为生断，鬼亦夜哭，然皆得自目击，有类纪事。初非爱其悲切，特撰为此等句也。‘舍弟江南死，家兄塞北亡’，对则工矣，亦有何致。有文无情，事必至此。无病而呻，词家所忌也。”以杜诗为范例，谈诗之真首先是情真，很有新意。文学是表达思想感情的，没有新的思想，没有独特的感受，即使描写穷形极象，惟妙惟肖，也不能算好作品。唐元竑在明代能有这样的见解，是难得的。唐元竑从禅喻诗谈到诗忌直说。他说“昔人以诗喻禅，唯然有之。禅家有言，切忌道着。诗非训诂，最嫌直说。即如‘天寒’二语，寻其文句，‘翠袖’、‘修竹’以当绝代姿，并是仙人手中扇耳。着眼仙人当在何处。《丽人行》‘肌理细腻骨肉匀’，可谓亲切，乃此语殊不为佳，明此者始可与言诗家三昧也。或曰‘婉兮娉兮，季女斯饥。非直说乎。’曰：然。叙事贵真，毋论《新安》

诸诗，即如‘天寒翠袖薄’，何尝不真。言情贵婉，《新安》诸诗，语虽直叙，原其微旨，盖欲居上位者闻之耳。然此意隐隐字句外，试取数篇读之，无一语显然及此，所谓切忌道着也。若乃‘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’，便与‘肌理细腻’无异，不为人所称矣。”（卷一）这里所谈的是诗的形象思维的问题。文学作品是用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，故思想应隐含在艺术形象之中。如果思想直说，思想也就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，使思想与形象失去了统一，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。唐元竑提倡用艺术形象表达作品的思想，确实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，是非常有见地的。然而，唐元竑的看法有时有点死板胶固。“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”，其情特真，其意特好，直抒胸臆，千古无有，乃是好诗。唐元竑对赋、比、兴三种创作方法的运用也有很好的见解。他说“诗之比兴赋，天然有之，下笔自来，不须有意撰造，亦不得截然分别孰兴，孰比，孰赋。多有兴而比，比而兴，比兴而即赋者。妙正在此。有意撰造，即不能佳。如《凤凰台》、《石笋》、《蒹葭》诸诗是也。”（卷二）诗人平时应该进行创作方法的研究与培养。而在创作时则应全力进行构思和内容的表达，而不能在此时尚想什么地方应用什么表达方法，这就是所谓得意忘筌的道理。唐元竑在这里所谈的符合创作的规律，符合创作的规律。

唐元竑不仅宏观研究有心得，微观研究也有深入的体会。论杜诗“读书破万卷”的“破”：“‘读书破万卷’，此‘破’字颇难解。犹谚云破财，虽未罄，已经消耗曰破。万卷未必首尾皆诵通，已无不寓目

者。此虽夸语，却甚斟酌。”（卷一）言“破”字的含义，言用“破”字的准确，体会精微，确实是独到的见解。谈《望野》诗的艺术也很精彩。他说“《望野》诗字字如画。‘独鹤归何晚，昏鸦已满林。’但‘鸦’、‘鹤’对举，意已自浓，何必更有所比。”（卷一）谈杜诗用赋法，而诗却具有浓郁的诗意，也是很有见地的。

唐元竑还对关于杜诗的传统说法或注释提出不同的看法。如关于《前出塞》和《后出塞》诗的写作时间问题。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杜甫安史之乱后作于秦州，而唐元竑则认为应是安史之乱前所作。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。他说“前后出塞诗，公集中最烜赫者，人人诵习。然皆从旧注，乾元时公在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作。更无异说，亦不言大将为谁。独东坡云详味末篇，盖禄山反时，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。姓名不可传，可恨也。坡信具眼，然亦以为乾元后作。盖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皆已有明证，故不疑耳。不知正此是淆讹处。当通前后细参其意。前九首云‘君已富土境，开边一何多’，又‘苟能制侵袭’，又‘何时筑城还’，又‘古人重守边，今人重高勋’，又‘虏其名王归，系颈授辕门’，后五首云‘借问大将谁，恐是霍嫫媸’，又‘六合已一家，四夷且孤军’，又‘拔剑击大荒，日收胡马群’，又‘献凯日继踵，两蕃静无虞。渔阳豪侠地，击鼓吹笙竽’，又‘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’，又‘将骄益愁思’，累累诸言，咸太平全盛时，乘障备边，拓土俘馘，或取功名耳。至于大将止忧其骄，何曾一字及叛逆与乱离耶。然则‘坐见幽州骑’二语何谓？曰此乃公先见，假逃将口决其必叛。

‘坐见’云者，犹抉眼吴门观越兵之入耳。此诗必作于天宝末年，禄山未叛时无疑。注非也。不然公刚肠疾恶，乾元间笔底每及叛逆，必以蛇豕虎狼叱之，岂有贼骑已长驱河洛而犹称为大将，铺叙边功，且极夸其治军严肃者耶？况追叙前事诗至十四首，而竟无一语及目前，亦断无此体格也。不可不辨。”（卷一）考证详明，说理透彻，《前出塞》和《后出塞》诗为安史之乱前所作无疑，旧注错误。《赠花卿》一首驳斥讽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之说，赞同胡元瑞认为花卿乃歌者姓名。他说“‘锦城丝管’一绝，题云‘赠花卿’。解者谓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，此诗讽也。近世胡元瑞驳之，谓花卿乃歌者姓名偶同耳。或问二说孰是，曰元瑞是也。节度使僭妄，当时诚有之，敬定偏裨也，胡不思至是。然花卿之为敬定，旧注已然，亦不始于用修。如元瑞，真具眼也。且如解者言，题当云‘花卿席上闻乐’，岂得但言赠花卿哉。即如‘成都猛将’一篇，题云‘戏作花卿歌’，盖旁观持论，亦非投赠，与同杯酒接殷勤之欢也。敬定虽骄恣，然一时定乱功高，赏不酬劳，死后血食。‘人道我卿绝世无’，虽止赞其勇，意当时蜀人之论必有不同于朝廷者。公虽心是朝廷，篇中极口揄扬，亦未尝没其功也。天子礼乐谈何容易，假使显然僭踰至此，公固一饭不忘君者，尚肯垂涎其酒食，从容宴会，交纳赋诗乎？”（卷二）分析颇中肯綮，对于正确理解《赠花卿》的内容极有好处。唐元竑认为“‘脱身薄尉中，始与捶楚辞’，应该理解为不作薄尉这样的小官，才免去自己被长官的责打。他说“‘脱身薄尉中，始与捶楚辞’，谓唐时参军薄尉受杖者是。鲍引

昌黎诗驳之，非也。诗意了然，不烦他证。此与‘饥鹰侧翅’，‘跨马触热’，下语皆带轻薄。从古豪杰皆取功名于涕唾之间，此亦何足讳且耻。而公固深不满之，亦由其性固然。汉世祖所谓狂奴故态也。”（卷一）从历史事实和文意本身来说明“脱身”二句的含义是脱离作参军和薄尉等小官，从而免受长官责打。唐元竑的辨说至今仍有价值，仍有不少学者至今抱守旧注谬说。

唐元竑对前人改杜诗也有批评和是正。宋明一些人喜欢按自己的想法篡改原作的字句，这是不良的风气。它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，使原作失真。其甚者更使原作造成不可解读。杜诗的遭遇也是如此。唐元竑说“‘风吹沧江树，雨洒石壁来。’‘树’字是‘去’字之误。晦翁创造之，可谓少陵功臣，至‘朝廷烧栈北，鼓角满天东’，初无误字，倘因蜀有漏天之说，遂改‘满’为‘漏’，则‘烧栈’字对‘漏天’亦须为之说始得，岂可使杜句偏枯至此耶？今集中因晦翁语竟改‘满’为‘漏’。又‘不愁巴道路，恐湿汉旌旗’，须溪谓‘失’字好，盖据‘云归拥树’例耳。不知在彼则字工，在此则意晦矣。今集中亦竟为‘失’字。其余妄改未能悉数。昔山谷欲改东坡‘白头’字为‘日头’张文潜以告，坡曰：黄九欲改作‘日’字，我亦无奈他何。吾欲援此语为公叫屈。至如‘新炊间黄粱’改‘闻黄粱’，‘行蚁上枯梨’改‘倒蚁’，‘娟娟细蝶过闲幔’改‘开幔’，‘把君诗过目’改‘过日’，‘因知贫病人须弃，能使韦郎迹也疏’，一小说改上句云‘不知贫病关何事’。改尽如此，九原有知，当亦輶然。”（卷二）朱

熹所说系理校，而其余例证皆系妄改。这些批评虽然严厉，但完全是正确的。唐元竑对杜诗也有所批评。如《少年行》批评杜诗意与题不合。他说“少年行‘老瓦盆’一首，意亦佳，然与题不合，几于失旨，吾无取于此。”（卷二）批评“流落剑三千”辞不达意。他说“《寄贾严二阁老》诗‘苍茫城七十，流落剑三千。’梦弼注：剑阁三千余里。是也。洙注引《庄子》‘剑士三千’，非是。但‘剑南’、‘剑北’、‘剑外’字单用皆可，‘剑三千’不可。”（卷一）所批评甚是。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元竑研究杜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。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，使得他不被历来注杜和说杜者的牵强附会所蒙蔽，努力体会杜诗的真意，求得杜诗的真解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元竑所论，虽未必全得杜意，而刊除附会，涵泳性情，颇能会于意言之外。”（《杜诗攷提要》）这个评论是大致符合实际的。

宋明时评论杜甫的作品，一般只评诗，不评文。唐元竑评诗也评文。评文，是对杜甫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。唐元竑论杜文像论杜诗一样，也往往由对作品的论述而进到对杜甫的论述。论《天狗赋》等，进而认为杜甫性刚负气，颇似陶渊明。他说“公所进《天狗赋》、《雕赋》在《三大礼赋》之先，皆引以自况。使其见用，风概可想。昔靖节自谓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，公仿佛似之。晦翁云：隐士大多负性气，当知儒门自曾子以下，无论隐显，必有一副劲骨。不如是，如何表见千万世耶。独自颜子，其劲骨无从而见之，故仲尼称其好学。比其死也，曰今也则无。未闻好学者于时。曾子现在《大

学》传。曾子，仲尼尚未许其能好也。《易·乾》曰：自强不息。《坤》曰：厚德载物。刚盖用以自克，岂用克人哉，则圣门所谓学可知矣。”（卷四）进而论述儒者的刚，是用以自励，是自强不息，是好学。这也是对杜甫的刚的诠释。唐元竑还通过分析杜甫的《东西两川说》认为杜甫有经世之才，良吏之才。他说：“《东西两川说》欲分诸羌部落，各自统领，不使羌王得专其命。此论最妙。汉晁贾之策亲王也，尚曰众建诸侯而小其国，况蛮夷乎！至于蛮夷畏汉法治之，诚宜宽大，勿轻扰之。赋敛宜薄，非宽富人，宽富人乃以宽贫人也。观其处分，井井谭兵羌，利弊亦甚悉，岂得谓非良吏才乎。昔人谓右军具经世略，惜为书法所掩。唯公亦然。今人但知其能诗耳。”（卷四）历来人们都沿袭新唐书的说法，认为杜甫喜谈论时事，高而不切。唐元竑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。我们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。从杜甫的《东西两川说》看，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，提出的对策是有力的，具有可操作性，说明杜甫并非不谙政治的夸夸其谈者，而是有政治才能的。唐元竑还通过《皇甫淑妃神道碑》的研究，探讨了唐代的妃子制度和杨贵妃专宠以前宫中后妃的情况。他说“《皇甫淑妃神道碑》题称‘唐故淑仪赠淑妃皇甫氏’。按，唐因隋制，皇后下有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各一人，为夫人，正一品。开元中，玄宗以一后四妃，本法帝誉，而后妃四星，一为正后。今既立正后，复有四妃，非法。乃于皇后下立惠妃、丽妃、华妃三位以代三夫人，为正一品下。此即不称妃，此武惠妃所以礼秩一同皇后也。今妃卒于开元二十三年，惠妃尚在，应用三妃之号，

而制曰‘宜登四妃之列，式旌六行之美，可册赠淑妃’。其后太真亦仍称贵妃，盖复依旧制矣。据碑文，妃薨时年已四十二，而文中云‘上以服事最旧，佳人难得，送药必经于御手，见寝始回于天步’，亦可谓宠幸不衰者。考其时，武惠妃正承恩宠。年亦四十，又未已亦卒，而太真始进，遂至专宠。其后六宫无复进御，即江妃不得分宫中一席之地矣。然则妃死于二十三年，亦不幸之幸乎。”（卷四）考证精详，有裨于史学。

综上所述，《杜诗攷》对杜甫和杜甫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，进而还对相关的唐代社会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学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，多有开拓与创新。

《杜诗攷》也有明显的缺陷。首先是见解与判断有明显的错误。杜诗“白鸥没浩荡”本是正确的，而认为不符合句法，反赞成“白鸥波浩荡”。他说“‘白鸥没浩荡’宋敏求定作‘波’字，极是。东坡说非也。毋论鸥不解没，但‘没浩荡’无此句法。”（卷一）“没”即消失之意，为动词，用“没”字正构成一标准的主谓宾句子。而“波”用在句中，没有谓语，则句不成句矣。苏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。其次，在论说中大谈命运，宣扬迷信。他说“《赠郑广文醉时歌》，

精妙不必言，事后追考之，颇似一篇挽诗。与其生平履历，句句贴合。公无前知术，何由得此。昔人画龙点睛则飞去，画女子刺心即痛。伎艺到绝处，岂有神灵凭其笔端耶？诗有讖若此，毋怪今人动多忌讳，见贫病老死字，弃去不肯竟读也。然郑之饿死命也，不因公此诗。其千古犹有生色，则实以此诗故，殆难为俗人言。”（卷一）唐元竑生在一个迷信气氛很浓的时代，自己又不得志，故特信命运，也喜欢从命运的角度论杜诗，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非常荒唐，故也就成为他论杜诗的重要瑕疵。第三，版本不好，多受误导，多发谬论。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说，唐元竑所读殆为黄鹤补注本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版本，本为坊刻，错误较多，一不留神，便跟着误本犯错误。《赠田九判官梁邱》“宛马总肥春苜蓿，将军只数汉嫫姚”，认为“春苜蓿”不对“汉嫫姚”，实际上刻本误刻“秦”为“春”。而论文中所引的苏轼议论，其实并非苏轼议论，而是注中的伪东坡《杜诗故实》。如本文前所引，即可作为例证。伪《杜诗故事》本来低劣，引入文中，无论赞成反对其观点，都降低了自己论文的质量。不过这些瑕疵是次要的，无法掩盖他论文重要的价值与光辉。

责任编辑 潘 珺